

关于西部的思考

周宜兴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居高望远

宜興同志

費孝通

九十岁



目 录

第一部分

对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1989年1月)	(1)
悉心探寻西部发展的推动力(1989年11月)	(8)
甘肃——潜在的经济大省(1990年2月)	(16)
发展西部亟待回答的几个问题(1990年5月)	(21)
“三西”建设的启示(1990年7月)	(24)
论“科技兴西”(1991年2月)	(27)
鼓励·期望·厚爱(1991年9月)	(30)
“亚欧大陆桥”与甘肃发展(1991年8月)	(34)
甘肃:面临好机遇(1992年6月)	(37)
闯内陆城市开放新路(1992年9月)	(41)
西部与东部要同步协调发展(1993年6月)	(43)
影响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1994年5月)	(46)
依靠科技进步促进西部发展(1995年6月)	(50)

西部发展正逢时(1997年12月)	(52)
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思考与建议(1998年1月)	(54)
甘肃省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的思考(1998年11月)	(63)
关于甘肃工业结构向两个50%调整的思考(1999年12月)	(70)
甘肃应做重大战略调整(2000年2月)	(77)
西部开发的劣势何在(2000年10月)	(82)
黄河清,西部兴(2000年11月)	(87)
兰州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2000年12月)	(91)
重视发展文化产业,组建名牌产业集团(2001年4月)	(96)

第二部分

研究贫困经济学,调整我国农业政策(1990年3月)	(98)
河西走廊农业的发展(1990年8月)	(103)
河西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1991年2月)	(107)
也议三峡工程(1992年7月)	(111)
农民负担依然重,减轻仍须再努力(1995年2月)	(114)
资金、科技、营销在财政扭补中的作用(1995年5月)	(118)
把河西走廊生态环境的改善,列为《中国21世纪议程》实施 计划的重点工程之一(1998年6月)	(125)
希望考察论证“引洮济渭”水利工程(1999年4月)	(129)
加大治理干旱与荒漠化的国家投入是发展大西北的首要条件 (1990年6月)	(132)
对退耕还林调研后的一点思考(2000年6月)	(136)
也说南水北调西线工程(2000年10月)	(139)
定西农村的变化令人鼓舞(2001年5月)	(143)

第三部分

建立待业保险制度为深化改革服务(1991年9月)	(152)
中国的人口与发展问题(1996年2月)	(155)
十二亿人的改革大业需要十二亿人的奉献(1998年3月)	(181)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1999年2月)	(184)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能单靠政府行为,人民群众也 应作努力(1999年3月)	(188)
直面就业压力,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发展的战略目标 (1999年10月)	(193)

第四部分

民主党派的一代新人(1987年2月)	(202)
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武装我们(1993年11月)	(207)
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与阶段性(1993年11月)	(209)
读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之感(1995年3月)	(211)
邓小平理论的功绩(1996年5月)	(215)
洗雪百年国耻 喜庆香港回归(1997年7月)	(218)
《沉沦的权力》序言(1997年11月)	(220)
政协委员是政协发挥民主监督职能的主体(1999年3月)	(223)
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渊源与发展(1999年10月)	(226)

第五部分

敦煌夜市(1991 年 8 月)	(236)
两次被俘、两次婚配的光棍汉(1993 年 2 月)	(238)
我与西装(1994 年 3 月)	(244)
走马观花识美国(1997 年 6 月)	(247)
重视保护古代民宅建筑(1998 年 8 月)	(269)
文化与生活(1998 年 10 月)	(270)
我经历的这 20 年(代跋)(1999 年 2 月)	(276)
后记	(281)

对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1989年1月

(《科技导报》杂志)编者按: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发展战略和格局,一直是各方有识之士忧虑、关注的一大问题。东、中、西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失衡,固然有其源远的历史因缘,但面对这份悲剧性的遗产,我们当代人是简单地承受、默认,还是用现代的科学求实眼光,以时不我待的奋进态度去深究中、西部在中国现代化大潮中重新崛起的一切契机和潜势,力转成局,是至关重要的。无可否认,在面对西部发展的种种难局时,人们往往有某种无可奈何、徒叹无力的偏见和情绪。只顾眼前、先顾一头的思潮时时泛起。这实际上是当代盛行的“短期行为”在区域发展战略层次上的一种反映。

然而,西部问题果真是“积重难返”到只好再一次“留待后人虑”了吗?本文作者从科学求实的角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文章朴实无华,但分析精辟,论证独到,见地不凡,读后令人豁然。相信识者定会作出会心的反响。若此文最终能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进程中,“石破天惊”,引发出西部开发的新战略、新格局,实为中国一大幸事。

中国西部^①从没有产生过一个符合西部实际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即使是一些有独特见解的设想也较为少见。一是由于中国管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妨碍了大的经济协作区的形成；二是由于长期以来，在中国形成的西部落后、贫穷的概念和西部投资效益低的偏见，导致了在制定国家总体发展规划时，对西部的忽视态度；三是由于西部自身的自卑感和依赖性。长期受制于中央计划的约束，长期依靠中央拨款过日子的局面，使西部的自我发展意识淡薄，自我发展能力低下，因此对发展战略的研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利益结构的区域化，区域间的利益竞争强化了区域极化的发展。特别是优先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提出之后，中国东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这一严峻的现实，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西部省区的政府官员和经济界人士对西部经济问题的重视，大家都把注意力投向西部经济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方面。一个旨在探求和设计中国西部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热潮开始了。

研究中国西部经济发展问题，必须既承认西部经济落后的现实，又必须充分认识西部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优势和所处的环境劣势。西部的落后人皆知之，而西部的优势却鲜为人知，且往往又被偏见所掩盖，被不公正所扭曲。本文就中国西部经济的发展优势和开发问题提出几点想法，供研究中国西部经济的学者参考。

人口优势：对 10 亿人口的中国来讲，考虑任何经济问题，首要的一条就是要研究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惯性，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及其大小。在这一点上，西部有着非常优于东部、中部的条件。西部各省区的人口总数是较少的（以甘、宁、青三省区为例，其人口总数约为 3 000 万）。因此，西部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完全可以在启动惯性较小的优势下，获得较大的发展速度，从而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有可能超过东部、中部的大多数

省、区。西部的这一优势往往被人们忽略，尤其是被西部人自己所忽略。当然，人口素质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西部人口素质相对东部、中部要差一些。但是，人口素质是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而不断提高的，而人口过多的负担，却是永远难以卸脱的制约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被扭曲了的经济效益：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西部投资效益低的观念，即所谓西部投资的“黑洞效应”之说。这一说法成了经济决策者与经济专家们制定投资规划的一个不成文的依据，一个不利于西部的依据，一个不公正的依据。实际上，西部的投资效益是被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和价格政策扭曲了。

建国以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对西部的投资主要用于发展以铁路、公路为主体的交通运输业，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大三线工业体系。第一到第六个五年计划的30年间，国家在西部的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26%。这些投资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中国西部工业的基础和生产规模。几十年来，西部工业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少企业的经济效益是相当高的，是名列全国同行之首的。

但是，从总体上看，西部投资的综合经济效益确实很低。究其原因有二：第一，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妨碍了西部经济的综合发展。西部的工业分属于中央各部、委或总公司，它们各事其主，很难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更没有与西部的地方经济相结合。墙内是现代化的大工业，墙外是落后、贫穷的农业和牧业。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中国的西部表现得尤为明显，矛盾也较尖锐。中央各部、委和总公司通过西部工业，把西部的资源吸走，但并未对资源地的西部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应有的帮助和支持。这种带有掠夺性质的开发，使西部经济发展缓慢，地方工业、农业、牧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综合效益必然低下。西部工业就像荒漠中的几棵孤独的大树，既然没有在自己的周围造就出

植物群落，它自身也就难以根深叶茂。第二，计、统、低的价格政策，使西部大吃暗亏。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对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西部极为不利。西部生产的95%以上的原材料，被中央各部指令性计划统一以低价调走。比如甘肃的镍，1988年国际市场价格约为2万美元/吨，国内市场价格为7万元~11万元/吨，而国家从企业调出的计划价格仅为2.15万元/吨。宁夏的优质太西煤，国际市场的离岸价是95美元/吨，而国家从煤矿调走的计划价格仅为30元~33元/吨。这种例子还可列举出许多。正是这种价格差所形成的价格漏斗，使西部每年净损失约数10亿元。这种损失在财政收支上是表现不出来的，是从漏斗中暗暗流失掉的。人们所能看到的是，国家从财政上每年给西部每个省补助若干亿元的明账。这就造成了一个错觉。国家对西部的巨额投资，在西部没有引起经济上的增长，反而像无底洞一样，年复一年地需要中央财政不断地给予补贴。难怪一些没有深入西部做实地调查，而仅凭财政统计数据作分析的经济专家要做出“黑洞效应”的结论来。

这种暗漏明补的经济格局，使西部各省、区长期处于“吃饭财政”的状态，即财政收入仅够维持生计，没有更多的财力去改造国土、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并对农业、牧业给以有效的投资。这就是建国几十年来西部仍有大约1/3的农、牧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暗漏明补的格局，还造成西部大多数工矿企业的低效益和亏损，大多数企业无力更新改造设备以提高生产能力，地方工业的发展就更为艰辛。建国以来，中国西部的工业、农业与建国前相比确有长足的发展，但其综合经济的发展水平却仍然很低，尤其是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干旱贫困区的人民生活，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准上。“捧着金饭碗要饭”的表现，正是由计、统、低政策的凸凹镜所扭曲而产生的。

在平等条件下进行区域间竞争：中国的改革，促进了区域极化的发展。但是，区域间的竞争却是在极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

的，这使西部仍然处于吃亏的地位。本来，在产品经济的旧体制中，西部生产的原材料按计划低价调出，西部所需东部深加工的制成品也是计划低价调入，进与出基本上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价格体系方面实行双轨制，对西部的原材料及能源继续执行产品经济的计划低价政策，而东部进入西部的多种制成品却按商品经济实行市场价格。这样就使西部蒙受了原材料与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这种本来是国际市场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往来中出现的掠夺性质的剪刀差，却在中国国内的区域竞争中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东部与西部的差距不是减少，反而是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西部不仅在价格方面蒙受损失，而且在产品自主权方面，由于无权支配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从而也失去了对紧俏原材料所拥有的市场优势。在双重体制下，东部越是开放搞活，其投资就越多越大，从而促使社会总需求的膨胀；越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尖锐的时候，国家对西部的原材料就统得越死，西部所吃的亏也就越大。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怪而不怪的现象就是：西部尽其水电、矿产资源和劳力而生产的高耗能有色金属，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低价被统配调出之后，东部某些省却利用这些物资，用其所拥有的外贸权，进行镍、铝、硅、铁等紧俏原材料的炒买炒卖，从而大赚外汇，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双重体制下的西部正是在被捆住手脚的条件下与别人竞争的。所谓西部是“富饶的贫穷”的现象，就是由不平等条件造成的。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应当尽早改变。

为了使西部能在平等条件下参加区域竞争，国家应当从三个方面对西部给予政策方面的投入，即放开原材料价格，退还西部应当拥有的产品自主权，给予一定的原材料外贸出口权。这样西部就会获得经济上的发展能力和竞争优势，才能与东部各开放省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协作与竞争，才能具有吸引外资的优势，从而使西部经济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过

程，不再需要财政补贴，把“黑洞效应”变成“热核反应”，减少乃至消除与东部的差距。这对西部来讲，并非过高的奢想，而是完全可能的现实。

新的机遇：1988年初，当优先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提出之后，西部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基本上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理论，把中国分成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并按此顺序，优先加速发展沿海，重点发展中部，西部作开发准备，这种时序与空间三阶的发展部署是必然的。因此，国家对沿海在投资上、政策上给予倾斜也是必要的，只有当东部、中部发展起来之后，发达地区的资金才会转向西部。因此，今后一二十年内东部与西部的差距只会进一步拉大，这是中国区域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相反的另一观点则认为，区域竞争必须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给予东部沿海的优惠政策，也应当给予西部，西部更需要政策强投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在充分分析了西部在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之后指出：必须研究在优先发展沿海经济的总战略下，应当同时给予西部某种反倾斜政策，使西部经济也不失时机地同步发展起来，而不是等待，也不能等待。

1988年7月在兰州召开的甘、宁、青三省区经济发展研讨会上，产生了一个“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方案，以及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中的“云贵高原经济开发区”的方案，都是为中国西部经济的同步发展所作的实证研究。这两个方案的实施，将为西部提供良好的开发环境与条件。西部应当以这两个开发区的建设为契机，制定出符合西部实际的宏观发展战略规划，尤其要重视对中国西部国土的整治，要对西部的农业与牧业给予极大的重视和足够的投资，尽早使西部广大农牧民走向富裕。切忌过去只重视大工业的发展，而忽视周围群落同步发展的老路子的重演。这是西部经济区别于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之点，只有把握住这一特点，中国西部经济才会真正发展起来。这里借鉴国际

上对矿产资源地区开发的经验与教训是有益于制定中国西部的长远发展规划的。要防止苏联巴库油田在石油资源开采枯竭后，整个资源地一片废墟、满目苍凉的景象在中国西部重演。希望美国加利福尼亚边开发石油、边改良资源地生态环境，同时全面发展资源地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使资源地同步繁荣起来的经验，在中国西部采用。这样随着中国西部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丝绸之路之路将会显示其现代化的新风采。

注：①学者们在论述中国问题时，把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划界。本文所指中国西部，并非行政区划中的西北与西南，而是指中国西部目前尚处于经济贫困状态的甘、宁、青、云、贵诸省、区。四川、陕西从其地理与经济特征看应属中部。西藏与新疆两个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有其特殊性，亦不应划归西部经济地带。

悉心探寻西部发展的推动力

1989 年 11 月

1989 年 9 月 6 日至 2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教授在他即将步入 80 岁高龄之际，不畏艰辛，轻车简从，长途跋涉纵贯整个河西走廊后，又折转向东南，走天水，过秦岭，入陇南山区，历时 18 天，行程 4 000 多公里，完成了他对甘肃的第五次考察。这是自 1984 年以来，费老考察甘肃历时最久、行程最长、考察内容最广泛的一次。费老悉心观察和分析在考察中遇到的每一件事物和现象，用深邃的思考去挖掘寓于一个个典型事物中的共性和规律，从西部开发出现的各种模式中，探寻西部自身的多种社会推动力。

大企业的推动力

“去年，我们提出了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与方案。这个方案切实不切实？有什么好处？在这个问题上，通过这次考察，我很乐观。甘肃已经开动了，不是空谈，而是干了，并且找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子。在发展与开发方面，速度是非常快的。特别是看了金昌和白银两个开发小区，印象是深刻的。”这是费老在结束这次考察时，一个总的观感。费老所讲的可行的路

子，就是国营大企业通过城乡结合、城乡一体化的一厂两制的办法，来发展西北经济的路子。

1984年，费老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了西部边远地区的贫困问题上，同时也开始注意研究边远地区国营大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当年费老在包钢考察时曾提出“人文生态失调”的观点，并发现企业在自发解决这一失调问题时，出现在国营大企业中的集体所有制小厂的萌芽，并将其总结为“一厂两制”的雏形，加以肯定。

1988年7月，在兰州召开的“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研讨会上，以费老为首的民盟中央代表团曾多次向甘、宁、青三省区领导提出，用一厂两制的办法搞活大企业，发展地方经济的建议。在这次甘肃之行中，费老考察了一厂两制的方式，即由白银公司和白银市联合开发的白银西区、由金川公司和金昌市联合开发的金昌东区。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同志在陪同费老参观白银西区时，曾非常兴奋地向费老介绍说：“甘肃本着先开发小区的原则，一年时间搞了5个小区的开发。在小区内结合甘肃的情况搞了一厂两制，孤岛式的大企业和地方结合起来了。今年有8大公司都介绍了这方面的经验。预计到1990年，在这些小区中，仅一厂两制这一块产值就可达10个亿。”可见，一厂两制已在甘肃显示出其生命力。

考察中，费老先后与白银公司、稀土公司、805厂、金川公司、酒钢公司、厂坝铅锌矿等甘肃境内的中央企业的经理人员及这些企业所在地的地方党政领导多次讨论了如何用“一厂两制”的方法，使大企业与地方相结合，发展地方经济，改变大企业孤岛状况的问题。在讨论中，费老多次阐述了他对一厂两制的观点。

费老谈到：自古至今，西北的发展都是由外边进来的。古代把农业引了进来。从汉代开始，大批的汉人进入河西，把农业带来了进来，改变了这里单一放牧的状态。建国之后，大工业进入西

北，也是外来的、注入式的。由中央定点，在某地建立某个大的工矿企业。这种注入式的大工业，一进来就与地方是隔离的、分割的。一个大企业就是一个与周围社会隔绝的孤岛式的小社会。大工业的建立对当地的农、牧民的生活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墙内墙外的落差很大，矛盾也很多。这些大企业从 50 年代开始建厂、投产，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品被国家调走了，留给地方和企业的极少，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很弱，生产设备没有更新，生产规模没有扩大，而企业自身的人口却在不断地增加和膨胀。到了七八十年代，第二代人要就业，第三代人也生出了不少，一系列具体问题要企业自己解决。企业的孤立处境，使他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边远地区大企业的人文生态失调现象，这种现象曾一度使企业陷入了苦恼之中。职工子弟中大批待业青年的压力，在国营大企业中，压出了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分厂，这就是一厂两制的萌芽。

但是，这种单纯为解决职工子弟就业的一厂两制，仍然是封闭在大企业小社会中的产物，仅仅是企业自身体系的扩大，产生不了太大的经济效益。一厂两制必须进一步走与地方相结合的道路。企业与地方合作，搞多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以向外扩散的方式建立一系列集体经济的中、小工厂，把地方经济推动起来，以此来解决大企业与地方落差过大的问题，解决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在谈到这一观点时，费老非常风趣地说：“大企业就像大观园一样，你们拔根毫毛，对地方、对乡镇就是一个不小的支持。地方也应有投资，是合作，不是靠大企业。我希望这根毫毛能够吹得远一点，扩散得更多一些。比如稀土公司，在稀土应用方面开发了一百多个应用项目与产品，一个项目为一个乡建一个企业，一下子就可以带动一大片，而你自己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这样一来，既帮助了地方，又搞活了自己……”

在金川公司，总经理王德雍向费老汇报公司发展一厂两制的体会时说：“公司在搞一厂两制前的 27 年中，在产品经济体制

下，一直是单打一的镍和铜的生产，路子越走越窄，困难重重。自从成立镍都实业公司、发展一厂两制的企业以来，3年间与地方合作，共建了96个集体经济的工厂，有几个年产值1000万元的厂，仅10个月就建成投产，发展速度很快。今年这些集体企业的产值可达2亿元，明年可过2.7亿元，正好是公司1983年的产值。这就说明用一厂两制发展集体经济，三四年功夫就可带出一个大公司的产值。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费老经过考察得悉：4年前金川公司职工的年人均收入为2000元，而公司周围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不足100元，公司与周围群众的落差很大，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从1986年开始搞一厂两制，公司从技术上、设备上、资金上帮助地方发展乡镇企业，为公司生产辅助生产资料。今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600元，农民与公司的关系很和谐。金川公司与金昌市合作的金昌东区的一厂两制企业，已经向高科技产业迈进了。一厂两制给公司带来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好处，大大促进了公司的发展。费老在这次河西之行中，向所到过的各个大厂矿企业的领导人员一再说明：搞一厂两制一定要从企业的自身的扩大，最终走到向地方扩散的方式上来。这样会走出一条搞活国营大企业的路子来。一厂两制的办法不会产生承包制那样的短期行为。费老非常肯定地说：“这是发展西部地区的巨大推动力之一。”

八十年代的甘肃移民

1984年以来，费老在他的前四次甘肃之行中，就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部干旱的定西，调查那里农民的疾苦，研究和探寻温饱线以下农民的脱贫路子，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多方寻求国内外对这一地区的技术与资金方面的支持。第五次甘肃之行，费老到河西走廊和黄河新灌区的移民村，走访从中部干旱地区来这里安家落户的移民，实地调查了移民情况。